●卷头语

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法]阿兰·李比雄

“天国和人间存在的东西远比哲学家所梦想的多得多。”

就是基于这一假想,国际跨文化组织创立了;为了阐明这一假想,《跨文化对话》应运而生。在欧洲文化的母腹中孕育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类学——对人的认知,或说得更宽泛些,对人类自身和世界的一切知识,今天发觉自身正处在迈向新时代的边界上,这将深刻地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诠释方式。当前,欧洲人类学需要向其他非欧洲文化的认知方式敞开门户,赋予非欧洲文化以诠释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模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再次发现。

十年前,也就是1987年,一群欧洲、非洲和中国的学者认为,由于当今全球一体化和交流的迅猛发展,建立一种相互人类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创建了国际跨文化组织,一个各国大学间的研究网络。它的主旨是开拓不同文明的互识道路,并通过了解非欧洲研究者对我们欧洲的认知,致力于涤清各种文化之间的误解,并在最适宜的相互观察的机制下创造发现对方的最好的相聚环境。

1988年,我们和广东的大学的学者们就意大利社会这一人类学课题开始研究,时值中国开放发展,于是一个研究项目在欧共体

的支助下达成了。此项目以土地研究为主题,共举行了十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6月,国际跨文化组织举行了一次巡回学术会议,探讨“‘普遍性’研究中的误解”,为期一个月,地点从广东到北京,取道丝绸之路,与会中欧学者们对各自的文化进行相互的认识和思考。(参看《独角兽与龙》,199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1994到1996年,中—欧又一项目:开辟经济新前景被提了出来,这促进学者和企业家人际网络的发展,使经济领域和学院研究领域联系起来,成立了中—欧企业家俱乐部。此次活动是在广东(1996年1月)举行的国际会晤中实现的,并创建了“中—欧无墙大学”。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些人定期出席,这得益于网络通讯的应用,并确保了交流的持续性。鉴于这种跨文化的前景,无墙大学应致力于建立一套灵活的思考和商谈的体制,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它能对各种文化模式为发展中—欧关系而相互碰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并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接纳在创造未来中遇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模式。

问题的关键是中—欧文化各自与知识和科技的关系,更宽泛地说,就是文化行为对科技发展的影响问题。

三个世纪前,莱布尼兹(Leibniz)在《Novissima Sinica》(《中国的最新消息》,该书已于1992年出版中文版)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今天欧洲是如此腐朽败落,正需要中国向我们输送一批传教士教我们自然之道,就如当初我们派出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一样。”莱布尼兹三世纪前的真知灼见已经和我们今天国际跨文化组织的宗旨不谋而合了。但也许得等到三百年后的今天,等到西方和欧洲混乱不堪,尤其是等到我们意识到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说的“封闭的时代开始了”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莱布尼兹这一看法的现实意义。

对世界的局限(也就是瓦莱里的“封闭的时代”)的发现,也是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局限感的发现。只要还存在“一种物质”、“一小块”地方,“一个省份”是未知的,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就是只要还

存在一个“孤立人群”，我们就能在那里找到批判精神的用武之地，并在那里检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正确程度。

但当我们达到这些局限的时候——这一临界线并不意味着一个未知世界的开始，而是意味着结论的循环，当我们行完了人类状况的各个不同阶段，而这些不同阶段被归为一个尺度，我们西方人于是一头撞进了虚空，撞进了纯工具化的人类学研究之中：我们孜孜不倦地以我们的尺度、我们的标准丈量周遭的世界，对参照物的普遍性深信不疑，对标准尺度深信不疑，而这些工具和尺度是我们自己在精神游戏、语言游戏中铸造的。就因为我们曾将它们施用于异国人群中，我们便以为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尽管未知的天地、未知的人类生存空间真实存在，我们自欺欺人地希望，一方面能证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的科学的优越性，同时能展现普遍的特点——随着征服世界胃口的增大——科学的普遍性、对物质的衡量和认知、对人自身的衡量和认知。

当谎言编织好了，我们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竟然是我们自己，更确切地说是自身的投影和变形：这种变异被切切分分，用我们语言游戏的尺子去剪裁，用我们的秤、用我们的标准去称、去量，于是我们被恐慌和烦闷攫住了。怎么，多种多样的人就是这副模样？人根本就非多种多样，而我们所想象的普遍性只不过是相同手势、相同尺度的一成不变的重复而已。

“封闭的时代的开始”对人类学而言是否就是始于这种重复？我在其他文章中也强调过，参观一个人种志博物馆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人类学研究所特有的剖析性质，亦即将人类状况细致分割，一方面是那种忧虑和烦恼，这是伴随人类学研究的一股有点罗曼蒂克的怀旧情绪。

艾德曼·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几页题为《地球不转》的哲思中以悖论的形式指出，发现地球的转动和运行远没能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世界和人类状况，反倒更加深了我们观察世界视角的定势。由此尽管有过哥白尼的革命，我们西方世界在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上依旧表现得和以往所有人类社会一样无

能，也许更加无能也未可知。这种本土意识使我们认为：世界从我们的视觉对其进行观察的那一点开始，并止于我们视线消失的地平线那儿。而科学的种种证实又都有助于这种看法的固定并普遍化，使西方人越发深信“知识来自西方”。

发现世界的种种局限，同时也发现了囿于循环论证的整个知识场的种种局限。从那时起，我们西方科技成就对世界的影响和控制通过收紧“撒向天空的网”，收紧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的科学知识的逻辑原则这张标点网只是让西方文化对各种不同的人类状况的视角更加固定，恒久不变。

我们可否这样设想：当西方对人类状况的认识意识到了局限，另一种视角的时代已经来临，当西方观察者的目光突然虚空了、或缺了，他们便在世界舞台上为别样的视野、别样的认知方式让出了自由的空间，他人的目光就出现了；我们知道人类通常只运用了大脑中极小的一部分神经元，还有很多可供利用，同样我们也可以大大开拓思想和认识的潜在田野。

因此我们处在一场革命的前夕，这场革命将在全球文明来临之际挖掘出到目前为止西方人尚一无所知的潜力——那些非西方的文化。

我们可否这样认为：在欧洲文化的母腹中孕育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类学——对人的认知，或说得更宽泛些，对人类自身和世界的一切知识——今天发觉自身正处在迈向新时代的边界上，这新时代将深刻地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诠释方式？

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样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重新发现。

是否在我们还没有想象到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孕育生长？什么才是明日世界的样式？我们不妨反用瓦莱里的诗句，今天，封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也许展现世界真正妙景的时刻从此开始。

(黄 荭译)